



宗教视域下的 中国文化散论

夏广兴◎著



宗教视域下的 中国文化散论

夏广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视域下的中国文化散论/夏广兴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6

ISBN 978-7-5426-5205-8

I. ①宗… II. ①夏… III. ①宗教—影响—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②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8631 号

宗教视域下的中国文化散论

著 者 / 夏广兴

责任编辑 / 冯 静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205-8/B · 419

定 价 / 36.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互汇,千百年来,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日新月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也使得多元宗教并存的现象长期存在,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中国宗教的多元并存的现象,不但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及思维模式,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民俗、文学、艺术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向域外拓展着它的影响力。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采取了自上而下、依附趋从的传播方式,渐次与中土传统文化交融互汇。进入唐代,佛教形态益加丰富,八宗并秀,判教立宗,形成佛教多样格局。尤其是禅宗、净土宗等,在有唐一代,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至有宋一代,禅宗在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广为传持,文人士大夫参禅话禅,并与禅僧相唱和,形成一时之风尚。唐宋之世,中土已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聚焦之地。鉴于此,东邻日本慕名来华求法、巡礼者络绎不绝,留下许多佳话,史不绝书。中日佛教界的互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各宗法脉,回溯有源。明清之世,民间宗教异常活跃,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儒、释、道三教的养分,并形成三教归儒的民

间宗教形态。佛教经六朝至隋唐、两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互汇,形成一支强大的宗教力量,并不断向域外传播与流布。其中对近邻日本影响尤著。

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择取佛教思想中的幻化观,以及三教思想、观音信仰、佛经故事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展开论述。第二部分着重民间宗教在明清社会上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明清民间宗教的特征及三教归儒的民间宗教形态的形成原因。第三部分着重宋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以入宋僧来华求法巡礼为视角,进一步说明宋代来华日僧助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

绪 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千百年来,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日新月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也使得多元宗教并存的现象长期存在,成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和其他各民族一样,上古时期,原始宗教异常发达,进入中古时期,随着外来宗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祆教等的相继传入,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民间宗教等的发展与进化。同时,经过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交融互汇,形成了新型的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并渐次影响着域外文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经过前后几百余年的弘传,获得了空前发展,寺院林立,法音长鸣,僧俗频接,信佛已成为民众生活中普遍现象。随着佛教自上而下的流播及佛典的不断译出或重要经典的重译,都给当时世俗带来极大冲击,文人士大夫普遍熟悉佛典,礼敬僧人。文人士大夫逐渐形成信仰群体,多栖心佛典。根据历史记载,三国西晋时期佛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如曹植喜读佛典,其文学创作中有明显的佛教影响。《世说新语·文学篇》亦记载了当时人物精研佛典,例如殷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致、世之幽滞”。“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隋唐文人亦多有阅藏经历,如刘

禹锡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书”(指佛典中的四句偈)^{〔1〕}。特别是对流行较广的经典,如《法华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圆觉经》等内容均相当熟知。文人们研读佛典成一时之风,并频与各宗派义学大师广泛交流,佛学精深的义理已被他们所接受,渐次融入意识之中,佛教之盛行可见一斑。自魏晋以来,就形成了士大夫与名僧交往的风气。佛教带来离俗无执、慈悲恬淡的风范,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士大夫,一方面是名士习佛,一方面是名僧谈玄,玄、佛合流,一时成为风气,造成了魏晋士风的转变。进入唐宋时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佛教在汉魏六朝基础上步入鼎盛发展阶段。生活在这一社会环境中的“独善其身”的文人,与佛教发生因缘是极自然的事。

佛教在逐步走上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中,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佛教文化在人们的心灵中造成了种种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文人们正是怀着虔诚的崇拜佛教感情和文化心理,以文学创作参与着佛教活动,宣传着佛教思想,强化着佛教精神。小说是其中重要的文学样式,佛教的侵淫使得这些小说在构思、取材、故事情节和主题表达上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自然使小说明显染上佛教的色彩。同时,佛教的一些观念也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而流传。如佛教的神通观和幻化观就是其中重要一源。两者是佛陀说法时常用的方便之一,为阐述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佛法,佛陀或其高足弟子往往借用神通故事或幻化故事来现身说法。如被誉为“神通第一”的目连,其以神通力入地狱救母事,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佛本生故事中所述之前生后世事则全是神通力之表现。另外,应身化现说法的故事亦是通过幻化来阐释佛法,这在佛经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幻化实际上也就是六神通中之

〔1〕刘禹锡《送僧元暲东游序》(《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

“神变通”，表现自由化现的超自然的能力。这一切充满神奇色彩的想象，对思想活跃、开放乐观、喜谈怪论奇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无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亦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此观念运用到小说创作中。另外，随着佛教在民间的广宣流布，朝野上下形成了对佛教偶像的多元崇拜，其中以崇拜观世音菩萨最为凸显。观世音信仰源于印度大乘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土。两晋南北朝以来，随着有关观世音菩萨经典的大量翻译、注疏、意解，观世音信仰渐次畅行于世，游走于民间，僧俗二界亦创作大量“疑伪经”和各种“观音灵验记”等文艺样式，以应信仰之需。是时国家支离破碎，社会动荡不安，灾异频现，民不聊生，民众则通过虔诚持奉观世音菩萨，以解精神之需，致使观音信仰在大江南北广为盛行。有唐一代，佛教界不断翻译和持诵有关观音的经典，世俗间朝野上下亦十分崇拜观音。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瑞象亦应时而现，如时传秦王李世民在河南荥阳一役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之乱以后，于广武山夜雨朦胧中见“东南云际，光焰四射”，“观音菩萨，金身毕露”，秦王李世民等见状惊异，“顿首拜瞻”，后唐高祖即下诏于此建观音寺以应此瑞。^{〔1〕}又如在神功元年（697），北方契丹犯边，则天诏令法藏法师依法事驱逐边患，时法藏法师则奏请以左道诸法行之，则天诏从。法藏法师乃沐浴更衣，建立十一面菩萨道场，立观世音像于其中。数日后，契丹军队但见大唐军中有无数神王化现，观世音像亦浮空而至，因而战胜。则天下诏劳军言：“崩城之外兵士闻天鼓之声，良乡县中贼众睹观音之像。醴酒流甘于陈塞，仙驾引羣于军前。此神兵之扫除，盖慈力之加被。”^{〔2〕}宋元至明清，“变文”、“宝卷”等文学样式讲唱观音故事以及民间传说等广泛流布；观音塑

〔1〕 参见陆元朗《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文载《全唐文》卷146。

〔2〕 参见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文载《大正藏》第50册，283c。

像、绘画等艺术形式风行一时；观音道场、观音庙、观音山、观音洞等各地亦纷纷营建，渐次形成了中国化亦或是本土化的观音，并使其信仰愈演愈烈，风靡于朝野上下，至今仍在民俗文化中具有很大影响。宋元之际的观音信仰在三教合一的大环境中，进一步狂热化和世俗化。敬信观音可得殊胜善缘，“称菩萨名号，皆得解脱，凡诸所求，亦复如是”，因此，“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庄严妙相。”不说普通民众，即使是高高在上的仁宗皇帝也是“顶玉冠观音像，以朝百官”。大江南北到处建有观音寺院，很多寺院还附会相关的观音传说。

佛教在不断中国化的进程中，与中土儒道思想文化进行着柔性交融，在不断磨合中形成三教融合的态势。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初，儒学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进入两晋之交，随着佛教的不断渗透，加之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儒学地位开始动摇。有些站在佛教立场上的学者，为了帮助佛教在中土生存传播，吸取、融合儒家思想，曲意迎合，从而使佛教思想趋于儒化。如题为汉代牟子作的《理惑论》，即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宣扬佛学与儒学相一致。如牟融在此文的序言中说：“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认为“《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俗”，把佛学视为与儒学相容不悖的一种思想理论。三国名僧康僧会亦是一位调和儒释，援儒入佛的著名人物。如他的“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则把一些儒家的“格言”引进佛教。东晋著名学者孙绰作《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率先从思想上调和、会通儒佛。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更是积极协调儒佛的关系。东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学和玄学的交融，“三教调和论”更为流行。如宗炳在《明佛论》中说：“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

增皆空之尽。”“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儒家学者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归心》，强调“内外两教（指佛、儒），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杂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1〕}亦极力糅合儒佛。上述所谓的“格义”佛学阶段，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可见，从东晋时起，对于儒、释两种思潮的主要关系来说，已表现出了一种交汇互融的基本趋势。

随着佛教的流播，大量民间宗教及外来宗教吸收了佛教的教义而创教立宗，直接影响和推动着民间宗教的发展。明清之际，民间宗教异常活跃，且教派林立。大致自17世纪初叶算起，据《神宗实录》记载则有：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悟明教，皆白莲教之支派；又有无为教、老官斋教、龙华教、长生教、收圆教，多在江南蔓延；西南则有鸡足山大乘教、青莲教、金丹教；西北尚有罗教、圆顿教、明宗教……林林总总，不下百余种。但多为佛教、道教的流衍，或是佛道异端形式的教团。进入明代中叶，在中国南方的福建莆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民间宗教——三一教。清代中叶，又先后在四川、山东出现了刘门教、黄崖教，这些教派与其他教派不同，像罗教、黄天教、江南斋教等多以佛教、道教等教义为宗，且教主多为下层文化水准较低的宗教家，这些教派则是由中上层社会的知识团社转化而成，其开创时期教团的领导大都出身名门望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且多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学者。如三一教则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演化而成的宗教组织，三一教教主林兆恩

〔1〕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五“归心第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9页。

就是出身于闽中世代为官的显赫大族，本人又是一位贯通儒、释、道的大学问家，一生著述极富。“三一教”从明代创立至今，几度兴衰，仍代传不息。甚至在东南亚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些人在走向宗教殿堂，一呼百应，成为教主以后，其著述则成为教门的教义。如一百余卷的《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就成为三一教徒奉诵的经典。民间宗教已成为中国多元宗教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影响和普及面更为广泛。

佛教经六朝至隋唐、两宋，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互汇，形成一支强大的宗教力量，并不断向域外传播与流布。其中对近邻日本影响尤著。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自古以来有着长期友好交往，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拥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从考古资料来看，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当始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光武帝时期，约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易道、医术、天文、养蚕术等就已传入日本，而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正式的历史记录。据史料记载，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公元6世纪左右就已经展开了，至今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1〕}自隋唐以来，日本僧侣作为留学僧就跟随遣隋使及遣唐使来中国求法问道，并巡礼圣迹。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空海、最澄、圆仁、圆珍等，就是在奈良及平安时期以这种方式入唐，并将日本佛教的发展带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些来华日僧归国携回日本的唐朝文化却渐渐融入日本，并被传承和发展，孕育出崭新的日本国风文化。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

〔1〕据传说，佛教东渐日本是继体天皇16年(522)。当时中国南朝时梁人司马达等人渡海至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庵建寺，并内置佛像礼拜，这是日本民间传入佛教的初始。史籍所载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钦明天皇13年(552)10月，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及经论、幡盖等等。在公元596年，由苏我氏之子苏我马子建成法兴寺，标志着佛教开始在民间正式流传。但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并对日本文化产生深入影响，则仰赖日本僧侣之来华求法问道与巡礼圣迹。

达十九次之多,^{〔1〕}可谓是为了达到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日本在平安时代末期的宽平六年(894)正式中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日本同唐代官方的交流也由此而一度停止。之后,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日本中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一些意欲东来求法的僧人也驻足不前。这种情况大致延至宋初,近一个多世纪,很少有日僧入华求法。然而,两国之间虽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但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异常频繁,未曾中断,中日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仍处于活跃期。直至赵宋之际,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在非官方交往的不利环境下,由僧人主导,继唐朝之后再次达到高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宗教的多元并存的现象,不但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及思维模式,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民俗、文学、艺术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并且渐次向域外拓展着它的影响力。

〔1〕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页。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佛教与古代文学创作	1
第一节 佛教与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1
第二节 佛教流播与隋唐精怪小说	16
第三节 佛教幻化观与唐宋文学创作	30
第四节 观音信仰与宋元俗文学	48
第五节 佛教与明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71
第六节 佛经故事与历代笑话	94
第七节 三教论衡与小说创作	109
第二章 民间宗教与古代社会文化	123
第一节 从唐宋文献看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	123
第二节 三一教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135
第三节 明清知识分子学术团社与民间宗教	147

第三章 中国佛教的域外影响	162
第一节 两宋来华日僧朝拜圣地的转移	162
第二节 日本律宗与入宋日僧	173
第三节 日本入宋僧圆尔辩圆与宋文化	186
第四节 灵隐寺与南宋来华日僧	195
第五节 宋元来华日僧与日本水墨画	210
主要参考书目	222

第一章 佛教与古代文学创作

第一节 佛教与六朝隋唐的应验类小说

佛教应验类小说,又称灵验记、感应记、感通记、验传记、灵异记、冥报记、灵验功德记等,盖指向佛、菩萨祈祷、忏悔念佛、诵经、造经、造像之后,出现感通、灵异等神异经验的记述。这是在佛教东传并渐次兴盛的历史背景下,由佛教徒(或佛教信徒)以小说的叙事形式创作,旨在以此作为弘教工具,传播佛教教义、招徕信徒入教,为小说家族又增添了新的一员。这些灵验记中,有的则是文句繁富,情节曲折,极具文学色彩,颇类唐人志怪。抄写形式上,有些独立成篇,特意抄录,有些则附抄于佛经之前,宣扬抄诵该经的好处,连同此经本文一道流传。从思想内容看,它是采用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方法,以宗教宣传为终极目的,表现内容比较单一。随着佛教的广宣流布,当时文人多栖心佛典,礼敬僧人,他们写作志怪小说自然会记载那些经文佛缘的灵异。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强烈的宗教意识,是佛教中国化、通俗化历程的具体表现。对这些作品的内容、特征和价值的分析,对于研究古代佛教,及研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都大有助益。以下粗陈浅见,以就正同好。

(一)

佛教自两汉之际渐入中土,至南北朝时大盛于世,朝野上下,侈谈因果。与魏晋相比,南北朝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最重皈依佛教。佛教在朝野世俗生活中的影响很大。佛教信徒以各种艺术形式弘扬佛法,诸如造像、唱导、绘画等不一而足,使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佛教思想融入中国人的观念之中。佛教信徒为了自神其术,广布佛法,大力弘宣灵验思想。如“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段成式著《酉阳杂俎》)^{〔1〕},“至诚发心,必有诚应”(牛肃《纪闻》)^{〔2〕},“所谓至感冥通,有祈斯应矣。”^{〔3〕}与此同时,纷纷以志怪小说的形式,演绎佛理,“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4〕}有时甚至直截了当地明言编书宗旨:“感见之来诚有由矣,辩欣斯瑞迹,合集前后见闻之事,为《感应传》一部十卷。”^{〔5〕}把佛教中最肤浅的因果报应思想及灵验的事迹,用志怪书的故事体裁发挥出来。诚如王晓平在其《佛典·志怪·物语》中所言:“中国的僧侣文士,曾将佛经消化,转化为本国的、身边的故事,造成一种报应‘近在眼前’的逼真感觉。”^{〔6〕}故当时小说鲜有不被佛风浸染。此时期专明因果的志怪小说大量出现,成为佛教影响于中国小说的重要时期。此类小说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并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论述之:“释氏辅教之书,《隋

〔1〕《太平广记》卷一百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6页。

〔2〕《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00页。

〔3〕《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智能》,《佛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02页。

〔4〕《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5〕《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净辩》,《佛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03页。

〔6〕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唯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1〕}这在小说史的研究中是十分重要的见解，这类作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包括各种应验故事（如舍利应验故事、《金刚经》应验故事、《法华经》应验故事、观音应验故事等、报应故事以及神异传说等），现见于著录的仍有近二十种。^{〔2〕}杜贵晨先生将其称为“佛教小说”：“入南北朝后，这类作品骤然增多。都是专为弘扬佛法而作，在佛教为典籍，在文学则可视之为小说，似可称为佛教小说。”^{〔3〕}据李剑国先生在其《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一文中考证：“今可考知的第一部释氏辅教志怪书，是晋末谢敷的《观世音应验记》。”^{〔4〕}据其统计，唐前“释氏辅教之书”在当时的八九十种志怪小说中竟占有二十种，可见此类小说之兴盛。“自晋末谢敷撰《观世音应验》以来，释氏信徒竞相造作，诸如《感应传》《征应传》《宣验记》《冥验记》《冥祥记》《祥异记》《旌异记》《舍利感应记》等皆夸饰经像塔寺佛法之验，成式谓‘晋宋以来时人著传记彰明其事’，诚是也。”^{〔5〕}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梁·王曼颖《续冥祥记》、隋·颜之推《冤魂志》、侯白《旌异记》等等。

进入唐代，此类小说创作锐势不减，更是层出不穷。汉地僧人重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2〕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3〕 杜贵晨《中国古代小说散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4〕 《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5〕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